

寻访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历程的科学根基

——基于科学哲学视角的研究

物理学院 庄易诚

摘要：本文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出发，探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转变背后的科学性内涵。为此，本文依循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从回应波普尔对马克思的两重诘难出发，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实践观，进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科学”的含义。并以此为基础，运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和劳丹的“研究传统”理论，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背后的科学观念。最后，本文从具体的现实条件出发，分析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向中理论调整的原因，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活力。这一方法提供了一个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新视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哲学；证伪主义；科学研究纲领；研究传统。

近年来，“科学性”一词有着被滥用的趋势，似乎任何有道理的理论都可以以“科学性”自居，这使得“科学性”成为了一个过于宽泛并且意义不清的词汇。在今天，我们总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理论的科学性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或者仅仅需要一些浮于表面的诠释。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创立初期，遭到了很多来自科学哲学的批判。在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才得到较多的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在内涵上并不一致。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需要一些更精确的诠释。

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生着转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已经截然不同于马克思最初的理论，所以，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这背后的科学根基是什么？

对以上两个问题，科学哲学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

科学哲学是 20 世纪新兴的一个哲学分支，历史上大体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阶段。这一学科试图解决科学的划界，科学理论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等问题。我们的讨论也将从早期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波普尔出发。

一、逻辑起点：波普尔的两重诘难

波普尔是 20 世纪科学哲学领域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他对二战后的欧洲学术界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科学的划界问题的明确解答，即证伪主义。他的理论代表着科学哲学的早期形态。波普尔指出：“衡量一种理论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①也就是说，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该是证实，而应该是证伪。科学真理必须有被证伪的风险，并且能经受住这种证伪的考验，科学史上的一切检验都是为了淘汰错误的理论。所以，在他的理解里，知识的增长是一个猜测与反驳的交替出现并不断“逼真”的无穷进程，没有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声称自己到达了真理。

（一）第一重困境：预言与科学的统一

波普尔基于其证伪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两项主要批判。第一重批判是预言的科学性问题。“在这种学说的一些早期表述里，他们的预言是可以检验的，而且事实上已经被证伪了。然而马克思的追随者不但不接受这些证伪事例，反而重新解释这个学说的证据以便使之相符……通过这一伎俩，他们就破坏了这个理论所大事宣扬的科学地位。”^②

在这里波普尔说了两件事情，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有过失败的检验，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诠释是不科学的。此外，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追随者所做“预言”是一种无期限的预言，在资本主义让位于共产主义之前，这个预言永远无法被证伪，他们总可以用“福利国家”等措施暂缓了这一进程等说法来为之辩护，所以这种预言必然不是科学。这就是预言与科学的矛盾。于是，马克思主义连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一起划为了伪科学。

（二）第二重困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第二重批判是历史决定论的问题。波普尔在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主义的贫困》中宣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即“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③

波普尔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他认为如果掌握了历史的规律就能预测未来，而对未来的预言只有在孤立、稳定的系统中才能得以实现，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

^①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李、周昌忠、蒋弋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 52 页。

^② 同上，第 53 页。

^③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47 页。

混沌系统，偶然性的事件对历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次，预言本身就具有自我实现或者自我否定的功能。最后，历史深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影响，他认为知识的增长是无法预测的，或者说，对历史的预言不存在一个可靠的逻辑根据。因此，他得出结论，历史的预言不合逻辑，因此它绝不可能成功，历史没有规律，超历史的宏大叙事必然不是科学。

（三）评述

一定程度上，波普尔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当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存在严重的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并且把唯物史观错误地解读为了经济决定论，却宣称他们的理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最终第二国际的实践失败了，波普尔才能高调的做出以上的论断。另一方面，波普尔是站在新康德主义的立场上进行的批判，波普尔身处的是神话理论向自然科学知识转变的时代，他不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用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念。

我们似乎很难接受波普尔的两重批判，但必须承认，这两重分别来自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批判正反映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常见误解。从波普尔的批判出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澄清某些概念，为之后的讨论设立科学性的根基。

二、反驳重构：何谓科学？

（一）证伪主义的界限

波普尔试图为科学划出一道精确的界限。按照波普尔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确实不符合科学的定义。但是，几乎所有与社会和历史有关的学问都被他排除在科学之外，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并不都能满足他过于严苛的条件。科学中大部分命题都是全称命题，也就是普遍式的命题，因为涉及的对象是无限的，所以这类命题不能被证实但可以被证伪。但科学并不只有这一类命题，存在性的命题往往很难证伪，社会学的命题大多也都是统计意义上的，既不能被严格证实，也不能被严格证伪。

此外，在波普尔的理论体系里，知识应该按照“问题-猜想-反驳-新猜想”这样一个的循环上升的路径不断积累，按照这个理论，那些新生的并不成熟的理论在其初期根本不可能有存活的可能性，但科学史并不如他所预见的那样——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为例，哥白尼初次提出日心说时，由于缺少几个关键的辅助性假说（开普勒的椭圆轨道理论，牛顿的经典力学等），日心说在计算上不如地心

说的“本轮-均轮叠加”的方法精确，并且地球的运动与那个时期人们的直觉不符，按照这套理论日心说一开始就应该被淘汰——但事实并没有。

迪昂和蒯因进一步指出“我认为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①“当实验与他的预言不一致时，他获悉的是，至少构成这个群的假设之一是不可接受的，应该加以修正；但是，实验并没有指明应该改变哪一个假设。”^②我们通常无法直接检验一个理论，而需要引入一系列辅助性假设，比如检测仪器的参数，比如理论成立的条件等等。事实上，大多数理论都是在不断地修改其辅助性假设的过程中完善的。

同样地，历史并不能直接地检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必须要依赖另一些辅助性假设，因此波普尔声称马克思主义被证伪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迪昂-蒯因问题直接导致了我们要提到的“科学研究纲领”等理论的出现，将为我们提供一个解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新视角。

（二）波普尔的贫困

以上是从科学哲学自身的角度回应波普尔的第一重诘难。至于历史决定论，应该指出的是，《历史主义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两本著作是在反对柏拉图、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强烈情绪下写就的。“著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那些被认为黑格尔的、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哲学收集在一起，并冠之以轻蔑的“历史主义”名称。”^③

这里面其实蕴含了另外一重立场，那就是他认为规律和因果关系意味着对人类自由意志的否定。对此，我直接用学者卡尔的话作为回应：“决定论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所有人类行为问题。没有行为原因的人是无法确定的，这样的人就像是出于社会之外的人，同样是抽象的。如果人们假定人的行为不是由可以确定的原因决定的话，日常社会是不可能的。人类行为既是自由的，也是决定的，这要看从什么样的角度考虑人类行为。具体在实际问题上也有所不同。”^④

波普尔的贫困在于，他的理论是一种独断论式的准则，在这一准则里，实践仅仅被理解为试错，一种用来否定猜想的工具。他所构建的猜想与反驳不断交替的无穷进程恰恰是一种绝对化的，僵死的幻象。固然他不是空想的理论家，但他

^① [美]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8-39页。

^② [法]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

^③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91页。

^④ 同上，第191页。

的实践仅仅只是个人的实践,由此得出的过分简化的逻辑演绎明显脱离实际,他忽视了总体和部分的关系,忽视了科学理论所适用的范围,这种操作主义式的“证伪”不过是一种粗暴的,孤立的实践姿态。在这种康德式的观念里,认识的对象只能作为物自体永远停留在思维的彼岸,这正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反对的。以这种独断的二分法和贫乏的逻辑为基础,在涉及历史和社会的问题上他势必会走向不可知论的立场,因此他无法理解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更理解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三) 历史的规律与规律的历史性

波普尔的批判反映了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些常见的误解,例如“经济决定论”。这就是说,经济规律在历史的各个时期是普遍适用的,并且决定了历史的进程,而政治,文化,宗教,以及人的作用都是伴生的。对此,马克思明确批评过视经济规律为永恒真理的蒲鲁东:“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①考夫曼指出:“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②

马克思思想给出的不是某种先验的历史真理,事实上,马克思对一般历史规律的认可可是有限度的,他不承认任何无条件的历史规律,而规律有其自身的历史性,因此我们不应该去追问使这些规律得以成立的原因(波普尔的诘难正是在这种根据律的意义上的),马克思思想给出的,是在某个既定的历史阶段,确实已经发生的,已经被陈述的存在条件,它指向的不是某种可能的未来,而是具有现实性的当下。对马克思而言,历史规律是从当下的实践中发现的,而不是从某种“逻辑先天”中演绎的,它不需要任何先验的根据。

同样地,历史不会被任何纯粹形式的理论和模型所概括,也不会有其内在的起源和终极的目的,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之中,历史事件才能在复杂要素的重组中显现出来,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理论的颠覆。所以我们不应当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做某种超历史的,目的论的或者机械决定论式的解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5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111页。

规律的适用性仅仅来自于历史条件的相似性，不应当把其中规律性，学理性的范畴空泛化，因为它陈述的不是某种本体论上的必然真理，而是一套构建真理的方法论。或者说，唯物主义不是一座建筑物，而是一套设计学。

（四）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

在以上的论述中多次提到实践的概念，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根基所在。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实践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人通过实践认识世界，也通过实践改造世界。在马克思的观念里，历史不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而是人的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

科学与历史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科学有其自身的历史性，现实蕴含着历史，时代的科学也蕴含着科学的历史，这也是历史的规律具有一定有效性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假定存在一种没有时间性的无条件的科学方法，也不能假定存在一种无条件的，可用来检验科学理论。科学规律不会自身显现，它是历史和实践的产物。

所以，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时，不是在说逻辑实证主义或者证伪主义定义的科学，不是在说“精确地计算资本主义灭亡时间”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在说一种通过实践将自然、社会与人联系和整合在一起的现实活动，是一种面向实践的认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是在以一种方式界定科学。这并不是—种循环论证，因为“科学”这个语词本身的意义就不是内在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和历史的实践中，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对象性活动中被赋予的。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在这种意义下，科学应该被理解为人类出于一种本体论安全感的需要建构理论来描述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应当被理解为“通过实践渗透到人类社会每一个领域，使之成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③，而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无主体的理论，科学是人的科学，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联系起来的力量。

这种实践的观念也意味着当现实条件发生了变化，实践的对象就发生了变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③ 赛音巴亚尔、安维复：《马克思主义“科学”概念的重新认识：系统科学的审视》。载《系统科学学报》，2024年第1期。

原始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新的语境下创新发展,只有在这样的转向中理论才能存活下来,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要求,也是科学哲学的要求。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理论最终将以一种全新的形态确证自我。在明晰了科学性的内涵之后,我们将继续运用科学哲学的视角转向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三、理论进路:从“科学研究纲领”到“研究传统”

(一) 拉卡托斯:“硬核”的坚守和“保护带”的调适创新

为了解决证伪主义面对的迪昂-蒯因问题,拉卡托斯提出了一套新的科学哲学理论,称之为“科学研究纲领”^①。科学研究纲领是一组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结构的科学理论系统,由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即“硬核”,和周围的一系列辅助性假设,即“保护带”两部分组成。保护带是研究纲领中可反驳的弹性地带^②,当理论面临威胁,遇到“反常”^③时,科学家们会调整保护带来维护其支持的科学纲领。比如前文中日心说的例子里,开普勒的椭圆轨道理论就属于为日心说增添保护带。进一步地,拉卡托斯把科学的发展归结为“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退化阶段→新的进化的科学研究纲领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进化的科学研究纲领进化阶段”,保护带的不断调整恰恰不是否定了理论体系,而是在捍卫内核,捍卫整套理论的体系。

这套理论看似解决了证伪主义的困难,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清晰的界定一套理论的“硬核”与“保护带”,并且“硬核”往往是被回溯性设定的,也就是说,当一个理论被提出时,我们很难明确的说出这套理论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人们往往基于理论的后续发展来指出早期理论的内核。

用拉卡托斯的理论分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对此已经有较多的研究,^④但当我们仔细去审视,我们会发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是某种修改保护带以捍卫内核的简单关系。譬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其最根本的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显然并不是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的硬核。这意味着拉卡托斯的方法难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长期的现象。

^① 这套理论提出的另一个原因是修正库恩的范式转移理论。

^② [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34页。

^③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把科学的发展归纳为常规阶段和反常阶段,“反常”就是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出现的与预期相矛盾的现象。

^④ 如:王学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探微:作用机制及发展进路——基于拉卡托斯的“硬核”与“辅助保护带”学说》。载《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2期。

（二）劳丹：研究传统与科学理论的基本精神

劳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和“研究纲领”一样它同样可以被视作一种引导假定。劳丹指出：“人们可以立即发现,几乎不存在这样一套使人感兴趣的原则,能够在任何一个研究传统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始终刻划出它的特征。”“研究传统的发展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方式,这类变化,不仅涉及研究传统内的具体理论;而且涉及到研究传统的一些最基本的核心成分的变化。”^①

对劳丹来说,科学理论的发展仍然是调适其保护带,但保护带和硬核之间的界限被取消了。也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内核也可以做出一定的修改,这种发展模式被劳丹称为“自然发展”,同一套研究传统里的具体理论具有连续性和类似性,研究传统仅仅是一种研究的基本精神或者说指导原则,它规定一套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最重要的是,它指导其构成的理论如何被修改和调适,也指导这些理论如何为自身做辩护。

“如果一个研究传统随着时间进程已经经历了许多发展,那么在它最初的表达形式和最终的表达形式的方法论、本体论之间也许会有许多差异。”^②在这种观点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理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毫无疑问,他们都隶属于同一套研究传统,而这套研究传统正是马克思开创的,他们的基本精神都是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都从具体的实践出发。

需要指出,这套理论同样是不完善的。比如,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毛泽东思想对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并不具有劳丹所说的连续性,所做的也不是简单的一两处修改,这之间存在某种理论的断裂和跃变。但“研究传统”的理念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分析工具。

四、实践镜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认识

（一）总述：历史的观察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从马克思所预期的最先进的国家转移到落后的国家,革命的发起者从工人转移到了贫穷的农民。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预料到,十月革命会发生在在一个“错误的”国家。列宁不会想到,毛泽东会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来夺取武装政权,毛泽东预料不到,邓小平会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后续的理论转变并不是对马克

^① [美]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方在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81页。

^② 同上

思，列宁等人的否定，与其说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倒不如说时代的具体条件是不一样的，它们同时成为了一个有机统一体的不同环节，各个环节在表面上相互争执，但并不彼此矛盾，每一个环节都具有同样的必然性，而这恰恰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甚至是一种“背叛”的方式回归了马克思最初的设想，新的理论已不再是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但它恰恰是内容最丰富的，因为它才是真正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正如我们最初所说的那样，历史没有无条件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它的具体实践和转变的过程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具有现实性的整体。用科学哲学的论断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研究传统的开端，遇到反常现象时，它必然要调整自己的辅助性假定，甚至调整自己的一小部分内核来保证其有效性，这种调整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这两种解释殊途同归。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探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某一截面来具体阐述。

（二）理论、实践与矛盾的普遍和特殊：毛泽东的转向

毛泽东更多借鉴的是苏联的经验，但却修改了列宁主义的内核并重新回到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出符合中国实情的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不同，毛泽东面对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还有民族独立，抗击外敌，建设国家等重任，这也注定了他的理论要比马克思有着更多的面向，要回应更复杂的现实。另外，马克思的理论是从对黑格尔的颠倒中发展出来的，而毛泽东的理论大多来自于实践的总结。接下来，我们仅从矛盾与实践的角度一瞥这种转向。

毛泽东的实践观与矛盾观密不可分，在他看来，矛盾是事物的规定性，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面对复杂的现实情形，毛泽东批判将单一矛盾体系的奉为决定真理的教条主义式的认识论，他认为矛盾具有特殊性，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特殊性的两种情形。矛盾的特殊性表明事物中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是不平衡的。矛盾辩证法始终根植于矛盾对立统一的斗争之中，而不平衡法则贯穿于矛盾发展的始终，并由此必然区分出不同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维度。^①而“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②简单的说，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一样的。在具体情境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都可以相互转化，相互交替。

^① 肖宛直：《多元矛盾与法国唯物辩证法——以阿尔都塞和巴迪欧对毛泽东〈矛盾论〉解读为视角》，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这种“多元决定”^①的矛盾论是对理论核心的调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极大的丰富和补充。在他之前，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都犯了“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因而走向了错误的实践。做出这一调整是因为中国不具有和马克思或者列宁的时代相同的现实条件，中国面对的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等。毛泽东从实践出发，精准的把握住了具体的现实条件，总结出了相适配的规律，因而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在这种大尺度的调整依然隶属于马克思的研究传统，因为他与马克思都有着相同的精神——实事求是。毛泽东的思想正表明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需要忠诚于马克思的研究传统，没有必要忠诚于马克思或者列宁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结论。这与劳丹的看法是一致的。

（三）解放思想：邓小平的转向

邓小平面对的是一个尚未安稳下来的，贫困的中国。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总结的理论很多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中国。面对党内的“左”倾错误，邓小平在很大程度上“背叛”了毛泽东的想法，从“解放思想”到“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背叛”却真正的将马克思，毛泽东的思想展开为一副多彩的画卷。

“背叛”之后的理论,似乎与原来的理论“背道而驰”,但正是这种异质性的转变才使得研究传统逐渐变得普遍,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条件,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瞥见理论衍变的历史痕迹。

五、总结与展望

以下对全文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如下文中的导图所示。为了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转向找到科学性根基，我们依循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从波普尔基于证伪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两重诘难出发，揭示波普尔的错误和证伪主义的症结所在。并以此为逻辑起点，阐释和延伸了马克思的历史和实践观念，并诠释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科学”的含义，即一种通过实践将自然、社会与人联系和整合在一起的现实活动，和波普尔的科学观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科学性要求马克思主义随着具体条件的改变而发生转向。随后，我们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过渡到劳丹的研究传统，运用科学哲学的分析框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流变和发展背后的科学基础，即同一研究传统下具体理论的调适创新。最

^① 这是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体系化总结。

后，我们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再一次诠释了它的科学性。

实际上，科学哲学领域中还有很多理论框架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例如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这一学说把理论的有效性归结为其“拯救现象”，它与理论的使用者所关心的事情紧密相关^①，这对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有着重要帮助。限于篇幅对此仅做一些展望。

需要注意的是，科学哲学的理论只是提供了一套分析的框架，它能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流变，也告诉我们如何科学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这套理论是形式的，一个科学体系的内容需要具体的实践去填充。正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出来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继的理论当作一种普适性的真理去把握。以《浮士德》中的一句话作结：“理论全是灰色的，敬爱的朋友，生命的金树才是长青。”^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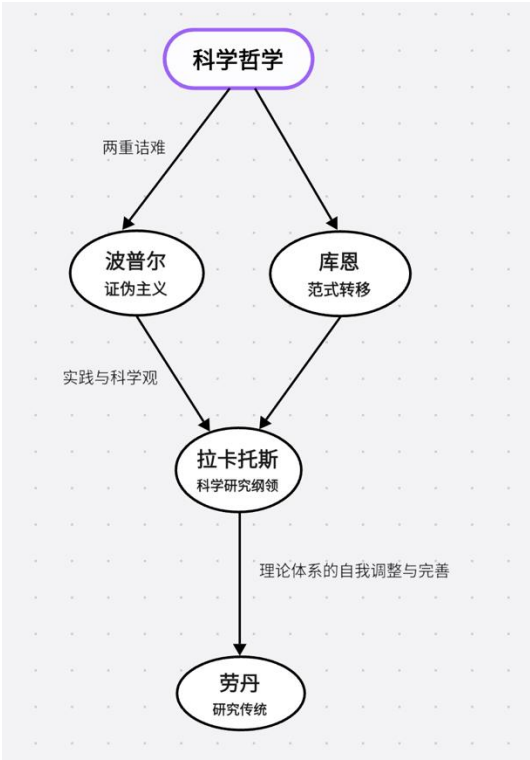


图 1：科学哲学的脉络和论证梳理（部分）

^① [美]范·弗拉森：《科学的形象》，郑祥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全书都有体现。
^② [德]歌德：《浮士德》，钱春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第 106 页。